

夏商周文明研究·十一

夏商周方国文明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4中国广汉)

王震中 高大伦 肖先进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夏商周文明研究·十一

夏商周方国文明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4 中国广汉)

王震中 高大伦 肖先进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2014年3月夏商周方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全书共收入论文28篇。内容涉及夏商周考古理论研究、方国历史考古研究、中央王国与方国关系研究、四川盆地先秦时期历史考古研究、重要遗存研究等方面。

本书可供从事考古学、历史学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及爱好者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商周方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4中国广汉 / 王震中, 高大伦, 肖先进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9

(夏商周文明研究)

ISBN 978-7-03-045855-1

I. ①夏… II. ①王…②高…③肖… III. ①考古学文化—中国—三代时期—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871.3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2609号

责任编辑: 刘 能 / 责任校对: 邹慧卿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张 放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年9月第 一 版 开本: 889×1194 1/16

2015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8 1/2

字数: 527 000

定价: 15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编纂委员会

主 任 王宇信

主 编 王震中 高大伦 肖先进

副主编 徐义华 雷 雨 邱登成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方 辉 王震中 冉宏林 朱亚蓉

朱彦民 杜金鹏 杨 洋 肖先进

邱登成 张国硕 周广明 徐义华

高大伦 雷 雨

序 言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编辑出版的《夏商周文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已经出版到第10集。在“夏商周文明研究”这样的总主题下，每一次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都有一个具体的议题。2014年3月28~29日，由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三方共同主办，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召开了“夏商周方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夏商周文明研究·十一·夏商周方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就是这次研讨会成果的汇编。

这里所说的“方国”一词，来自甲骨文中的“方”。自1904年孙诒让《契文举例》中提出“方国”以来，甲骨学界一般是用它来指商代与王朝或中央王国相对而言的各地方的国家，与周代文献中的“邦国”是同一个意思。甲骨文中的“多方”就是“多邦”的意思。在甲骨文中那些称“方”的国（方国），绝大多数与商王处于时服时叛的关系；而不称“方”的国，始终臣服商王者占绝大多数，其中有许多是被称为侯伯的诸侯邦国。这样，就涉及商王朝的国家结构问题。近年来，我曾提出夏商西周王朝国家的结构是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即在王朝国家中，有作为“国上之国”的中央王国，还有作为“国中之国”的诸侯邦国；王和王国处于“天下共主”的地位，诸侯邦国则不具有独立主权或者说其主权不完整；王国与诸侯邦国合起来，在王的统辖下，构成王朝国家。这样的王朝国家，可以称为多元一体，也可以称为多元一统。至于那些与王朝对立或敌对的邦国，因其具有独立主权，属于王朝国家之外的边远小国。我们这次研讨会讨论的方国文明，其方国概念是既包括受王统辖的诸侯邦国亦包括那些独立邦国，有一点地域文明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之所以要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三星堆博物馆联合举办这次“夏商周方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因为三星堆遗址近年的考古发掘又有重大收获和突破，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研讨会的议题和视野又并非仅仅局限于三星堆遗址。为此，在研讨会开幕大会上，既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详细介绍2012~2014年度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与突破；也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何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馆员邵晶分别对陶寺遗址和神木石峁遗址进行主题发言；还有吉林大学文学院考古系系主任、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王立新对商代方国都邑与商王朝军事重镇的异同发表主题演讲，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邓聪教授关于中国牙璋与夏商王朝政治制度的传播的学术演讲。这里编辑的二十八篇学术论文，也都是围绕方国文明而撰写的。其中，诸如杨升南《商代甲骨文中所见夏代诸侯》、张懋镕《周人不用族徽、日名说的考古学意义——从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谈起》、江村治树《二里头及商周城市社会的特征》、许宏《三代文明与青铜时代考古——以概念和时空流变为中心》、张国硕《夏代东方三方国地望辨析》、郭静云《商周虎方和盧方——两国空间范围考》、高大伦《成都平原古文明的活力之源》、冉宏林和雷雨《浅析成都平原先秦时期城址特征的变迁》、方辉《商周“夷式簋”的传播与族群变动》、王青和张云涛《墓葬所见胶东半岛周代莱

文化的几个问题》等论文，都是就夏商周文明特别是方国文明中的某一问题，做了非同凡响的、有新意、有深度、有思想的发表。身处学术前沿的杰出学者们汇聚一堂，发表高论，使得这次“夏商周方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成为有质量、高水平的学术论坛。

按照我们的设想，在本次研讨会“夏商周方国文明”主题的基础上，下一次研讨会的主题将确定为“中原与四方：夏商周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们中国殷商文化学会是有计划、与时俱进地把我国上古文明的学术研究向前推进。换言之，我国有关上古文明的考古发掘有积累、有收获，我们对上古文明的研究有进展，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就会不失时机地、以学术研讨会的方式、组织处于学术前沿的学者们展开讨论，并集辑出版。

最后，借作序之机会，我对作为主办单位之一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研究员、对三星堆博物馆的肖先进、王居中、邱登成、朱亚蓉和杨洋等几位馆长、对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冉宏林、对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秘书长徐义华研究员等，无论是在会务工作上还是在本论文集的编辑出版上，所付出的辛劳，致以谢意！也祝愿我们三方友谊永存，合作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王震中

2015年7月19日

目 录

序言	王震中 (i)
三代文明与青铜时代考古——以概念和时空流变为中心	许 宏 (1)
商代甲骨文中所见夏代诸侯	杨升南 (8)
二里头及商周城市社会的特征	〔日〕江村治树 (13)
二里头文化农业经济初探	高 寒 (18)
夏代东方三方国地望辨析	张国硕 (26)
商周虎方和盧方——两国空间范围考	郭静云 (34)
清华简“武王戡黎”与商周黎方	朱彦民 (46)
周人不用族徽、日名说的考古学意义——从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谈起	张懋镛 (56)
关于中国早期石磬的几个问题	郭 明 (62)
成都平原古文明的活力之源	高大伦 (79)
试论成都平原古蜀文化时期的石器制作技术	王 方 (82)
先秦时期墓上建筑研究	郭 明 (96)
浅析成都平原先秦时期城址特征的变迁	冉宏林 雷 雨 (117)
从绳纹演变看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变迁	杨占风 (128)
三星堆遗址商代城址的调查与认识	陈德安 杨 剑 (139)
浅析三星堆古城布局	陈显丹 (157)
三星堆遗址璞玉、籽玉、大玉料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敖天照 (164)
铜树、社树、钱树——三星堆Ⅱ号铜树与东汉钱树之研究	张肖马 (183)
从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看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	邱登成 (189)
古代中印交通与中国丝绸西传	段 渝 (198)
川滇石棺葬所见青铜戈	郭 富 (204)
商周“夷式簋”的传播与族群变动	方 辉 (216)
墓葬所见胶东半岛周代莱文化的几个问题	王 青 张云涛 (233)

浅析邢台发现的商代陶窑·····	石从枝（246）
安阳殷墟近年边沿考古新发现及相关问题·····	孔德铭（254）
北京琉璃河遗址ⅡM251墓主试析——兼谈西周时期“多族徽多人名墓葬”的墓主身份 判断方法·····	冉宏林（265）
成组玉石璧音乐性能与我国早期“同律度量衡”改革·····	幸晓峰 沈 博（273）
什邡静安村遗址火烧坑实验报告·····	万 娇（283）
编后记·····	高大伦（287）

三代文明与青铜时代考古

——以概念和时空流变为中心

许 宏

众所周知，三代，指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这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作为大的阶段划分的概念，其与史前时代、秦汉至明清时代一道被相提并论，三者当然有其相当的共性，但三代的特殊性也颇鲜明。同时，这些特殊性又并不都是不言而喻的。“概念是对研究对象的理性意义上的把握……概念的含义和阐释往往也标示着研究者对问题的把握深度和对其复杂性的认识。关键概念范畴的界定往往是研究工作的首要任务。”^①因而，对与三代文明相关的概念和时空流变，以及其与青铜时代的关系等问题再做梳理，就有其必要性，这也即本文的立意所在。

一、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的范式特色

首先，在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中，构成约定俗成的分类系列的几个概念本身就不是同类项。这形成了历史与考古研究的“中国特色”，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尴尬。

作为开篇的“史前时代”，采用的是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和历史（History）的分期话语体系^②。这一时代划分方法立足于各个时期在研究材料和方法上的差别，着重考察文字与文献的演进及其作用。陈星灿归纳了各国学者关于“史前”与“原史”的解释，认为“几种说法尽管不同，但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史前史应该是研究没有文字时代的历史，而原史则是研究文字最初产生时期或文字不起关键作用时期的历史”^③。显然，夏商周三代至少有一部分时段是属于“原史时代”的^④。但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摒弃这一概念不用，认为“从实际意义来说，原史考古学的重要性不如前两者（指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引者注）”^⑤。

史前时代，从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的角度看，主要属于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概念，也被广泛使用。这里采用的又是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期话语体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① 何平：《文化与文明史比较研究》，第1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② Christopher Hawkes.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Old Worl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54, 56: 155 ~ 168; Glyn Daniel. *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81: 48.

③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 ~ 1949）》，第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④ 许宏：《商文明——中国“原史”与“历史”时代的分界点》，《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⑤ 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夏商周方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中国广汉)

系^①。但这一话语体系也没有被中国考古学界彻底贯彻。由于进入王朝阶段就有清晰的朝代传承记录，所以只有“石器时代”被借用，其后的阶段划分就直接利用传世文献的话语体系了。

1952年，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全国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当时由考古所的郭宝钧讲授“殷周”一段的考古。1953~1955年，郭宝钧在北京大学任教，开始编写《殷周考古》的正式讲义（1954年油印本）。1956年开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殷周考古”课更名为“商周考古”，1956年编成《商周考古》讲义，截至春秋时期（油印本）。在1958年出版的中科院考古所业务学习教材《考古学基础》^②中，断代考古被分为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魏晋南北朝至宋元考古四个大的部分。此后的1960年，北京大学正式铅印了系列教材《中国考古学》第三编《商周——青铜时代》^③。

将“商周”和“青铜时代”并用，显现了当时社会风潮的影响。郭宝钧在其1963年出版的《中国青铜器时代》一书的“绪论”中，述及“本书依据这些地下资料，参以先秦文献和文字的写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拟分门别类，通商殷两周的史迹发展，作如下的综述”。在书中，作者分章概述了青铜器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组织和精神文化。现在看来，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此后，中国大陆再没有出版过一本综述整个中国青铜时代的专著了。关于后来对“青铜时代”概念的弃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商周考古》中有专门的说明：“考古学的分期法，是根据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把属于原始社会范围内的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种分期法正确地反映了人类征服自然界的歷史过程，曾经得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赞许而被普遍采用。但是，自从人类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成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考古学三时代的分期法已经不足以代表其时代的特征而失去了意义。夏、商、西周已是奴隶制时代，春秋已开始向封建制过渡，因此，我们一般地不采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期法。”^④

代之而起成为潮流的，是以文献所载王朝为线索的“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⑤。至此，史前时代（石器时代）+王朝分期，成为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的一种权威范式。

二、三代考古：模糊的时间上限

回到“三代”，可知上述物质文化和王朝断代的“嫁接”，在其衔接之处，却不是没有问题的。这与三代（至少是其早期）尚处于前述“文字最初产生时期或文字不起关键作用时期”也即“原史时期”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但由于中国考古学界长期以来弃用“原史时代”的概念，在“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两分法的框架下，夏商周三代多被简单地划入历史时期。如“作为历史时期考古学，夏、商考古必须参照文献记载，并倚重于地下出土的当时文字记

① 丹尼尔著，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第77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科学出版社，1958年。

③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编写说明”，文物出版社，1979年。

④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第4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⑤ 唐际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17日。

录，以期对相关遗存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解释”^①。事实上，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都搞不清时间上限的研究领域。单就此点而言，它并不符合“历史时期”最基本的条件——存在丰富而可靠的文献记录。

对传说中的“夏”的处理，最能说明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的“殷周考古”或“商周考古”讲义中，编著者认为由于“有比较可靠的文字记载，从商殷开始”，而“史记夏本纪所提到的夏代，也应该存在的，将来要靠发掘来证实”^②，所以对“夏”存而不论，由石器时代考古径直转入“商周考古”。

1961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则在“奴隶社会”一章下设“商殷”和“西周春秋”二节，“封建社会”一章下设“战国”一节。在“商殷”一节中，已开始探讨可能的夏文化了，但囿于材料，编著者仅提出“（河南龙山文化和洛达庙类型文化遗存）两种文化在探索夏文化中是值得注意的”^③。

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材《商周考古》，对“商周考古”的定义是“指夏、商、西周、春秋这一历史阶段的考古”，且在“商代”一章之前专辟一章“二里头文化”，虽书名和章节题目上未言明“夏”，但正文中已认为“二里头文化大体相当于历史上的夏代”（6页），是“一种介于龙山文化和早商文化之间的古代文化”（14页）^④。这已将龙山文化排除在夏文化之外，而将二里头文化排除在商文化之外，从而确指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了。翌年，邹衡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⑤出版，该书特辟专章论述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这也是首部在考古学上肯定夏文化存在的重量级学术专著。显然，邹衡在执笔《商周考古》教材时，已为其学术观点埋下了伏笔。在集体编写的公共教材《商周考古》中，具有极强的个人风格的“夏”学说已呼之欲出。

1984年，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全所之力编撰而成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出版^⑥。该书为夏鼐总负责，持论审慎平和。在“新石器时代”一章后仍沿袭成例，列“商周时代”专章，而综述三代。“商殷时期”一节下设“关于夏代文化的探索”专题，紧接其后的是“偃师二里头的早商遗址”，显然仍持二里头文化晚期属于商文化的观点。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考古学研究”综述一栏，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下列“商周考古”一文，同时附专文《夏文化探索和早商文化研究》，综述此前多年该领域的研究状况。连续两个年度的“商周考古”综述文，都是由考古所的学者撰写。到了《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由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撰写该时段的综述，正式冠名为“夏商周时期考古”^⑦，延续至今。

此后，各校的“商周考古”课不约而同地改为“夏商周考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也改为夏商周考古研究室。20世纪90年代后期，“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第60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43～45页，文物出版社，1961年。

④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⑤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⑦ 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1986》，文物出版社，1984、1985、1988年。

夏商周方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中国·广汉）

这应该和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的学术标杆作用和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日益深入人心有关，抑或与80年代偃师商城的发现导致更多的人倾向于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有关。无论如何，在没有决定性证据出现的情况下，由知名学者论断的影响和新的考古发现导致主流观点的变化，即可以使确认一个传说中的朝代的存在成为学界的共识，这是颇具意味的事。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仍在“二里头文化”一章前设专章介绍“夏文化探索”^①；2013年吉林大学三代考古教材《夏商周考古学》，鉴于“目前考古上尚未发现可标志夏代开始的确切遗存”，“只能暂将（早于二里头文化的——引者注）‘新砦期’遗存的起始年代作为夏商周考古研究的时代上限”^②。可见，尽管相关教材专著经历了从书名无“夏”到明确有“夏”的变化，研究方向由“商周考古”改为“夏商周考古”，但夏王朝遗存的不确定性，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国际学界通行的阶段划分之“青铜时代考古”，并未被采用和强调，这反映了中国考古学界的研究取向。

三、三代考古：模糊的空间外延

在20世纪50年代，“商周考古”的课程和教材内容还基本上是以中原王朝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为限的^③。这当然是受限于当时考古工作和认识的结果，但不能不说那时的概念界定是名实相符的。

196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铅印了系列教材《中国考古学》第三编《商周——青铜时代》，开始增加了“商周时期的边区青铜时代”部分。到1979年出版的《商周考古》，就分别在“商代”部分增加了“北方和南方地区商代其他青铜文化”一节，在“西周至东周初”部分，增加了“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其他青铜文化”，在“春秋中叶至春秋战国之际”一节，增加了“华南、东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一节^④。

在1984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商周时代”一章中的最后一节，是“殷周时代边远地区诸文化”。2003、2004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分别设专章介绍“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新近出版的《夏商周考古学》也有“周边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一章。

与史前时代（石器时代）概念的普世性，秦汉至明清时代以帝国为主的政治与文化“疆域”的大体稳定形成鲜明对比，三代王朝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内涵和外延都处于剧烈的变化中的。在广袤的东亚大陆上，它们是最早的一批广域王权国家。在其外围还分布着众多与其有交流、受其影响或完全未发生关系的其他青铜文化，甚至石器时代文化实体。这些文化实体，是无法用三代或夏商周的概念来涵盖的。张光直的《古代中国考古学》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就将“最早的文明：夏、商、周三代”和“‘三代’以外的最早文明”以两个并列的专章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② 井中伟、王立新编著：《夏商周考古学》，第1、2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第60~114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④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区分开来^①。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考古学界的三代考古或夏商周考古，已成为一个时段的考古学的概念。

那么，其空间外延，如果不限于三代王朝，又如何界定呢？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对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介绍，不仅包括黄淮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关中与晋陕高原、内蒙古中南部、甘青、燕山南北地区，还囊括东北及闽粤桂地区，甚至新疆天山南北也原本在其收录范围之内^②。《夏商周考古学》更开宗明义，指出“从地域范围看，本课程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中原地区的……文化，而且也包括周边地区同时期诸考古学文化”^③。其收录周边地区的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远较《中国考古学·夏商卷》更为“齐全”。上述处理原则，已有学者一言以蔽之：“夏商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现今中国境内夏商周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④“现今中国境内”这一当代行政和政治区划范围，成为考古学一个研究领域的空间界定指标。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还心存困惑：

三代文明=夏商周王朝文化=夏商周时代的文化=公元前2千纪至前1千纪前半段、现中国境内所有文化遗存，这一等式及研究上的处理方式是否成立？

所有在“现中国境内”的三代时期的文明，都属于三代文明的研究范畴吗？

三星堆、吴城、马桥、夏家店下层、朱开沟、齐家、四坝，甚至新疆地区的青铜文化……它们都属于三代文明吗？

所有年代上在“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都属于“青铜时代文化”吗？

与此同时，《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夏商周考古学》中三代王朝周边地区诸文化的介绍部分，分别约占其总篇幅的33.3%、11.4%和26.4%。由此可知，首先，三代王朝本体的内容，占了2/3甚至4/5以上，处于绝对优势；其次，与夏商相比，两周时期华夏核心文化的范围有了大幅度的扩展，强力“挤压”了所谓“周边地区”文化的生存空间。因此，上述统计数字也显现了三代文明不断扩展的动态过程。

至此，可以说，由邹衡等前辈奠基的三代考古或曰夏商周考古臻于大成。如果说邹衡是夏商周考古研究一个时代的代表，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仍然生活在邹衡的时代”^⑤。那么，这个时代的特色是什么？其定鼎之作《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7篇长文，分别论证了考古学上的（先）商文化、夏文化和先周文化。用邹先生自己的话，他的工作就是“把某些考古学上的问题引向夏、商历史问题的研究”^⑥。罗泰的归纳也许更切中其实质：“这几篇论文系统论证了邹衡关于夏、商、周三个朝代的考古学特征，商、周两个朝代的起源以及重要遗址的历史定位等重大学术问题的观点。”^⑦这是否也就是“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或者说，其最大的特色已蕴含于这个时段考古学的定名——“三代考古（夏商周考古）”中，或可

① K. C.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1986 (Fourth Edition); 张光直著，印群译：《古代中国考古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③ 井中伟、王立新编著：《夏商周考古学》，第2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④ 王巍、杜金鹏：《夏商周考古学论要》，《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⑤ 许宏：《从〈商周考古〉到〈夏商周考古学〉——由两本考古教材串联起的学术史》，《中国文物报》2013年9月13日。

⑥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写在前面”，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⑦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Zou Heng (1926 ~ 2005). *Artibus Asiae*, 2006, 66: 181 ~ 194.

夏商周方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中国·广汉)

称为“王统的考古学”？

如果“王统的考古学”对于此前“王统的文献史学”是一场材料和方法上的革命的话，那么今后我们应做的是什​​么？大概就是超越三代王统考古学的、对东亚大陆青铜文化宏观体系的建构。

如前所述，以三代作为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标尺而淡化青铜时代概念的不足，是可以显见的。有学者甚至认为，“由狭义史学观影响，考古发掘热衷于寻找与王统有关的遗迹和遗物”，“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造成了古代遗迹遗物作为科研资源的重大浪费”^①。鉴于此，李伯谦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有构建中国青铜文化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的思考^②，希望能“着力探讨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发展以及不同谱系文化之间的影响、碰撞、融合等问题，使读者对中国青铜文化有一个鸟瞰式的全面、系统的认识”。他指出，“我之所以对中国青铜文化的结构体系课题情有独钟，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一种认识。我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古代文化错综复杂，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家将中国青铜文化的研究重心放在中原地区的夏、商、周文化固然无可厚非，但随着中原以外各地大量青铜文化遗存的不断涌现，对之仍然不加重视，很可能就要犯‘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错误了”^③。李先生在上引其文集的《前言》中述及本想按着这一思路撰就一部专著，但一直未能如愿，这是颇为遗憾的事。

值得欣慰的是，仍有学者对此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孙华指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青铜文化体系繁复，要从总体上全面梳理中国青铜文化的材料，阐述中国青铜文化的概况，解释青铜文化存在的问题，理解青铜文化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目前虽然有不少研究者已经对一些具体的青铜文化做了文化这个层面的分析，但还缺乏对某一传统区的若干青铜文化从起源到消亡的全过程考察，至于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这个层面进行研究的学者则更是寥寥无几”^④。他的长篇论文《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对中国各青铜文化区的材料做了系统的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青铜文化的出现和消亡，以及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历程等问题做了宏观的考察和分析，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诚如作者所言，迄今为止，仍缺乏全面论述中国青铜文化的论著问世。学界翘首以待。

四、青铜文化视角的若干问题

预计具有中国特色的“王统的考古学”研究还将持续下去。与此同时，在前述学术背景下，若干问题或许是我们在中国青铜时代考古探索中最需要加以思考并尽力解决的。这些问题可归纳如下：

(1)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生及其动因。

(2) 欧亚大陆青铜文化格局下的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研究。

(3) 深入系统的分期和分区研究。把握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动态过程，关注各青铜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梳理出其消长脉络。

① 唐际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17日。

②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

③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前言”，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④ 孙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

(4) 中国青铜时代的终结，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的更替。

(5) 三代政治文明与中国青铜文化的关系。

其中最重要的，是构建考古学本位的关于中国青铜时代研究的话语体系。今天，当中国考古学学科的主要着眼点逐渐从建构分期与谱系框架的所谓文化史的研究移向以社会考古为主的研究，我们需要加深对作为考古学基础作业的“考古学文化”深度与广度的认知和把握^①。预计从“聚落本位”的精细化的微观背景关系，到诸区域“文化”的态势及互动关系，到诸如各类城址、建筑、青铜礼乐器、各类兵器、空三足器、金器、卜骨、权杖、铜鼓、大石墓—石棚、石棺墓、土墩墓等重要遗存“圈”存在状态的探究，都会有长足的进展，研究方法也将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学学科的转型而得到提升。类似于《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②这样的研究，应当得到提倡，增扩其深度与广度。作为一级学科的考古学，应当搭建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对话的平台，以其独特的学科视角与能力，贡献于哲学社会科学一般法则的建构。

有理由相信，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将在这一洪流中大有可为。

(原载于《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

① 许宏：《关于社会复杂化阶段考古学文化的断想》，《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年。

②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夏商周方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中国·广汉）

商代甲骨文中所见夏代诸侯

杨升南

夏王朝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据文献记载，为了有利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夏实行分封制，《史记·夏本纪》载夏代分封了十三个诸侯：“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缙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东汉王符《潜夫论·五德志》亦记载夏代封国十一个：“姒姓分氏，夏后、有扈、有南、斟寻、泊乳、辛、褒、费、戈、冥、缙，皆禹后。”《路史·国名纪丁》列举出夏代的封国有五十多个：骆、崇、虹、高密、阳翟、夏、辛、长子、西翟、观、扈、莘、巢、邓、纶、缙（二）、越、会稽、姑越、姑蔑、于越、句馀、瓠馀、顾余、闽越、黄林、馀不、姑於、海阳、琅琊、秣陵、东瓠、东越、越沔、句章、甬东、瓠人、瓠邓、诸暨、武城、没鹿、巢（二）、杞、婁（五楼牟婁）、阳、沛、泊、弗（费、邾）、冥（鄆三）、褒（二）、沈（寢）、男（南）、彤、鬻、鲍（四）、流黄、葷育、大夏，包括同姓、异姓诸侯。在商代的甲骨文里，我们发现五个诸侯方国与文献记载的夏代诸侯名同，他们应是夏代的诸侯而服于商者。这五个诸侯方国如下。

一、杞

春秋时期的人还知道杞、缙是夏王后裔所建的国，《左传》僖公三十一年：

卫迁于帝丘（今河南濮阳市），卜曰三百年。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鄆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

相是禹的第五世孙，他曾迁都于春秋时卫国的国都帝丘。甯武子反对祭祀相而应该由夏王的后裔杞国和鄆国来祭祀他。杞、鄆二国是夏人的后代，《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晋女叔侯说：“杞，夏余也”，所以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论语·八佾》）

在甲骨文里有杞侯：



图一 杞侯甲骨（《合集》13890）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丁酉卜，殷，贞杞侯夙弗其骨凡有疾。

《合集》13890（图一）

这是武丁时期的一片甲骨。此杞侯应是夏人的后裔，与宋是商人的后裔一样，王朝灭亡，胜利者封其后裔为诸侯。

周武王封东楼公于杞的杞地，应是商代杞侯的封地，周武王只是续封而已。杞国的地望，《史记·索隐》云：“宋忠曰：‘杞，今陈留雍丘县，盖周封杞居雍丘。’”故《地理志》云：“雍丘县故杞国，周武王封禹后为东楼公”是也。盖周封杞而居雍丘，至春秋时，杞已迁东国，故左氏隐四年《传》云：“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者，曹东邑也。僖十四年《传》云：“杞迁缘陵。”《地理志》：“北海有营陵，淳于公之县。”臣瓚云：“即春秋缘陵，淳于公之邑。”营陵即缘陵，地在今山东省昌乐县东南五十里古城。雍丘地在今河南省杞县。

二、曾

甲骨文中有曾这个地名，应是商时一诸侯国。缙国的缙字甲骨、金文皆作形，隶写作曾，武丁用兵南方的战事中，曾国军队为商军的左翼：

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从[我]，中从與，左从曾。

《合集》5504（图二）

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从我，[中]从與，左从[曾]。 《合集》5512

两片甲骨上的卜辞同文，但都有残缺，而所缺部分不同，参照两片甲骨上的两条卜辞可互相补上所缺的字，而成一条完整的卜辞：

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从我，中从與，左从曾。

“立事”即“莅事”，此辞中的“事”即戎事、战事，古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武丁在南方不会有祭祀活动，故此“事”只可能是戎事。右、中、左是商代军事编制的三师。我、與、曾是三个诸侯国名^①。李学勤释與为与（举）字的古体，谓“与（举）和曾是商朝南土的两个封国。湖北枣阳、随县、京山到河南西南角的新野，出土了大量周代的曾国青铜器。与（举）应在汉东举水流域，卜辞的曾国当在这一范围内”^②。这次战事当是《诗经·商颂·殷武》中歌颂武丁“奋伐荆楚”的战争。

商朝的封国曾应是夏朝曾国而顺从商者。从出土甲骨文和有铭铜器知，从商到战国，曾国



图二 曾国甲骨（《合集》5504）

^① 杨升南：《略论商代的军队》，《甲骨探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又载《甲骨文商史丛考》，线装书局，2007年。

^② 江鸿：《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